

主編 錢鍾書

執行主編 朱維錚·李天綱 編校

#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萬國公報文選/李天綱編校. - 北京: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,1998.6

(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/錢鍾書主編)

ISBN 7-108-01147-6

I. 萬… II. 李. III. 《萬國公報》-文集 IV. C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98) 第 16020 號

萬國公報文選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編校者  | 李天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責任編輯 | 潘振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設計 | 寧成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式設計 | 陸智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發行 | 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<br>(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) |
| 郵 編  | 一〇〇〇一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經 銷  | 新華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新華印刷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<br>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  |
| 開 本  | 六三五×九六〇毫米十六開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數  | 三千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數  | 五十五萬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價  | 印張五〇·六二五<br>七十二元                  |



# 編者說明

《中國近代學術名著》的晚清編，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，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。

遴選的學者和論著，着眼於學說有新意，有己見，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，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。

結集則不拘一格，以專題為主，每種或收一人一書，或輯一人多篇，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。

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：選擇底本，取原校較精的刊本；異本互勘，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；覆核引文，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；重施標點，包括分段；編製索引，分人名、書名兩類。

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，附於篇前。導言既重可讀性，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；也重學術性，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。為行文簡明，諸導言凡引證出處、攷訂史實或商榷

疑義，均以附注形式陳述。

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，晚清編擬分輯刊行，初定每輯十種，先成先印。如可按設想出齊，當能略見系統性。

這套選編，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，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。編輯設想、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，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，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鈞組織實施。

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，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。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，由於種種緣故，長期不克面世。現由北京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。

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，同時期待高明指正。

# 編例

一、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，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：底本。以原刊為主，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。

校勘。正底本排校舛誤，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，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。一般不作理校。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，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，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。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，於正文不作改動。

節錄。於篇題下注明，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。

標點。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，概施以新式標點。

分段。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，以便讀者。

注釋。作者原注概從原刊。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謬誤，以頂注出之。

譯名。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。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謬誤：則由編者逕予改正。為方便閱讀，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。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。

版式。概用繁體字，直排式。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，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，均改為通行繁體字。原作或有雙行夾注，現均改為單行夾注。

索引。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、書名兩種索引，以便通檢。

二、本叢書所選諸種，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，予以保留，並移作附錄。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# 導言

## 壹

晚清在華的西方人士所主辦的中文報刊，曾對中國的學術和政治的實際運動，發生過重要影響的，首先要數在上海出版的《萬國公報》。

然而當一八六八年九月五日、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它創刊的時候，正如它最初的名稱——《中國教會新報》所標識的那樣，卻是一份宗教刊物。

西方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，創辦中文的宗教刊物，在那以前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。還在一八一五年八月，當清嘉慶二十二年七月，受倫敦佈道會派遣來華傳教的英格蘭長老會牧師馬禮遜 (Robert Morrison)，在遭受心懷嫉妬的澳門天主教當局排擠之後，便跑到英屬馬來亞的馬六甲，辦了一份「以闡發基督教義為根本要務」的月刊，由他的助手米憐 (William Milne) 牧師編輯，取名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》(Chinese Monthly Magazine)。其中文名稱雖然很怪，卻被認為是近代意義的中文報刊的濫觴。鴉片戰爭以後，歐美人獲得在通商五口的居留權，而上海的租界很快成為歐美來華人員的主要基地，自然也成為新舊各派傳教士的聚散中心。倫敦佈道會的偉烈亞力 (A-

exander Wyllie)，首先在上海創辦了中文月刊《六合叢談》，選在清咸豐七年正月初一（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六日）發刊，大約在次年二月以後停刊【一】。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下旬，英商匹克伍德（E. Pickwood），創辦了《上海新報》，初為週刊，次年改為雙日刊，十年後又改為日報，隨即停辦。它雖是商辦，卻由英美三名傳教士輪流主編【二】。其中一名美國傳教士林樂知（Young John Allen），以後便成了《中國教會新報》的獨立創辦人。

《中國教會新報》雖是週刊，但每年炎夏隆冬各休刊一週，因而年出五十卷。四年後，即由一八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二〇一卷起，更名《教會新報》。宗旨依舊，還是「傳播福音」、「聯絡信徒」；體例依舊，也還是「教務」為主。可是，在這以前，從一八七〇年十月天津教案以清政府「委曲求全」【三】了結之後，這份刊物便愈來愈對中國的俗世時務表示出興趣。重新發表五年前兩名英國人——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（Robert Hart）和英國駐華使館漢務參贊威妥瑪（Thomas F. Wade）——向清政府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議【四】，就是明證。在更稱《教會新報》以後，這種薄「真」重「俗」的取向，越發明顯。雖說欄目仍以「教事」為首，但篇幅卻是「政事」居多【五】。即使在「故事近聞」一欄內，關於西方自然科學新進展的報導，也開始侵佔「屬靈」的篇幅【六】，用中國俗語來形容，頗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氣息。

《莊子》有言：「名者，實之賓也。」不論林樂知和刊物的主要撰稿人，同屬倫敦佈道會的艾約瑟（Joseph Edkins）、慕維廉（William Muirhead）等，是否比照過中國的這則古老哲理，總之在《教會新報》又出滿兩年一百卷之際，主編林樂知便出面宣佈：從下一卷即三〇一卷起，這份

週刊將再度更名，新名稱是《萬國公報》。

更名後續出的《萬國公報》，英文取名 Globe Magazine，直譯當作「環球雜誌」。就名實關係來看，中英二名，都已脫離「教會」之實。有趣的是刊名從實了，編撰諸人的署名反而務虛了。原先的文章，作者署名都稱「牧師」【七】，那是他們奉派來華的本來身份。但再更刊名之後，作者署名卻變成名不符實了。「美國進士林樂知」，「英國進士艾約瑟」，「美國進士丁建良（William A.P. Martin）」，諸如此類，屢見不鮮。誰都知道，所謂進士，是中國科舉制度下取得文官出身的特稱，非經皇帝欽授不得僭用，因而與歐美的博士學位是兩碼事。林樂知等竟然僭用，雖然利用他們都曾充當清政府的僱員，被授予過品級頂戴這一事實【八】，但也是利用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制度的無知。

不過，倘若撇開名實關係，從刊物編撰者的主觀意向來看，則所更刊名的非宗教化，所署名銜的純中國化，又無疑是在傳遞一個明白的信息，即未來的《萬國公報》，將越出「宣教」的領域，更多地面向中國的公眾，尤其是面向中國的士大夫。

很奇怪，林樂知在解釋更名為《萬國公報》的緣由的時候，只說如此一來，「既可以邀王公鉅卿之賞識，並可以入名門閨秀之清鑒，且可以助大商富賈之利益，更可以佐各匠農工之取資，益人實非淺鮮」【九】。就是說，除了不讀書的武夫兵痞，凡在中國能讀書的各色人等都提到了，但這又使他漏舉中國讀書主體，所謂四民之首的士，顯得越發醒目。

這一漏舉，只能令人懷疑編撰者另有隱衷。《教會新報》更名《萬國公報》，正值清朝的同、

光之際。由於滿洲宮廷政爭造成的極權統治的削弱，由於太平天國和捻軍相繼失敗造成的帝國復興的假象，使得被壓抑二百年的漢族士大夫乘隙而起，言論空前活躍。通過科舉「正途」而取得優秀文官出身的一羣翰詹科道官員，便順理成章地執掌了政論的牛耳。他們在同治末光緒初，以「清流」自命，放言高論，搏擊權貴，尤其集矢於原湘軍首領曾國藩、原淮軍首領李鴻章兩系統的軍功新貴。他們尤其討厭後者辦理的「洋務」，從而對由帝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關於外交事宜的決策極為警惕，總在懷疑這班達官顯宦媚外自重，能戰而言和，服硬而求軟，致使天朝顏面掃地。他們可能有意無意地充當了扶持慈禧太后實現個人獨裁的清道夫，但他們的「清流」輿論，在同光之際的確起了左右全國「士」心的效應。以致凡知域外事務者，不論教育程度多高，例如同屬「正途」出身的郭嵩燾、曾獲法國法學博士學位的馬建忠，都曾被「清流」輿論詆為「漢奸」。也許正因如此，林樂知等編撰面向中國公眾的《萬國公報》，唯獨不敢明白昭示他們心目中主要的讀者對象，其實是中國傳統所指的士大夫。

更名後的《萬國公報》，卷數和週期都與《教會新報》相接續，還是每年五十卷，每卷十頁左右，最高十八頁。出版者仍署「林華書室」，表明它其實仍是林樂知獨立主辦的刊物。經費來源，當由林樂知個人募集，但具體出資者，至今仍不很清楚，大概仍如《教會新報》，除林樂知個人由清政府取得的俸祿外，主要來自各國在華新教教士的捐助。

可得而知的，是更名《萬國公報》以後，第一主要撰稿人沒變，除林樂知外，還是艾約瑟、慕維廉，以及倫敦佈道會派遣的韋廉臣（Alexander Williamson）、英國聖公會的牧師傅蘭雅（John

lyer) 等。第二刊物內容在漸變，宗教性內容越來越少，世俗性內容越來越多，以致到一八七九年調整後的六類欄目中，首列政事，次列教事而外，新聞、格致、人文、雜事四類，佔據了刊物的主要篇幅；關於基督教聖經的解釋與宗教活動諸項報導的「教事」類，反而令人覺得可有可無。

### 【一〇】

在更名《萬國公報》以後，刊物的銷路漸有起色。它每季都出版合訂本，因為遲鈍而懶惰的清帝國各省衙門的官員，寧可訂購這樣的合訂本，而合訂本的訂戶，還包括日本的天皇及其內閣閣員，以及朝鮮的政府官員。【一一】遺憾的是中國的士大夫，可能並沒有對這份在上海租界出版的刊物完全置之不理，但在光緒初年不信基督教的政府官員和民間士人中間，還沒有發現公開承認購閱引用《萬國公報》的例證。

於是，《萬國公報》慘澹經營，不間斷地續出四百五十卷，也沒有實現林樂知的初始期望。出滿第九年，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（清光緒九年六月廿五日）第七五〇卷內，宣佈停刊。

停刊的原因，除了林樂知心有旁騖【一二】外，還有沒有別的理由，有待研究【一三】。總之，時過將近五年半，一八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，正值清光緒十五年的農曆正月初一，它才重新出版。

那時代的中國人，缺乏敏感的時間觀念，又極少留心外國人的新聞紙，對於《萬國公報》的停刊又復刊，以及前後有甚麼區別，並不在意。因此，當它復刊以後，漸漸博得清帝國上層人物和渴求新知的年青士子的青睞，聲價日高，這時人們也以為它向來如此，並不注意它在停刊前與復刊後

有何不同。

其實區別是明顯的。第一是刊名，雖然中文名稱依舊，但英文名稱已改作 *The Review of the Time*，直譯當作「時代評論」，重心在於論學論政。第二是主旨，復刊的首期便聲稱，它最重視的是「敦政本」，依次則是「志異聞」、「端學術」等，結語強調「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，皆在所不當遺也」【一四】，——然而對於傳教士來說，最為不該忽略的一點，卻沒有直接提及，那就是「教事」。第三是內容，屬靈的直接說教，固然在版面上罕見，俗世的政治學術諸問題的相關文字，固然佔據了幾乎全部的篇幅，而其中居然時時出現與教義相悖的西方學說的介紹，例如達爾文主義乃至馬克思學說的介紹，尤其令人詫異。第四是作者，主要的著譯，固然還是出自英美傳教士及其華人助手的協作；但純由華人完成的著譯，以及選載中國士人的自發的或應徵的來稿，也遠比停刊前多得多，這當然也使它吸引中國讀者的一大原因。

更重要的不同，也許是主辦者的變化。從《中國教會新報》到《教會新報》，再到停刊前的《萬國公報》，十四年間名目三變，主辦者始終沒變。資金籌措和編輯發行，都由林樂知獨攬大權。然而在一八八九年初復刊後，中文刊名沒變，主編人也還是林樂知，而刊物卻已屬於廣學會，由廣學會投資並發行。林樂知雖然也是廣學會的主要成員，但依據英美的民主習慣，他必須在刊物中貫徹廣學會的總體意向。就是說，復刊後的《萬國公報》，性質已起了變化，由林樂知的林華書室的獨辦刊物，變成了在華西方人士一派的合辦刊物。

復刊後的《萬國公報》，既然性質已變，則如新辦刊物一樣，期數也必定從頭另行計算。它仍

然是月刊，但每期不再稱「卷」，而改稱「冊」，冊次則連續標舉。一八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復刊號，稱第一冊。終刊號為第二三七冊，時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，當清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。總共出版的時間，長達十九年又九個月。假如從初更名之時算起，則《萬國公報》由一八七四年九月到這時，首尾統計三十八年又三個月；略去停刊時間，實際刊行的時間，仍有三十二年又十個月。因此，海內外的中文論著，習慣稱它前後存在時間有四十年左右，雖不準確，卻不算過度誇張。

這二百三十七冊《萬國公報》，每冊頁數也固定為三十二頁，載文合漢字約三萬。版面有社說，評議政治和中外時事，譯介西方政論及倫理等學說，包括上諭和臣工奏摺的摘錄的光緒政要，以及各國新聞和電報輯要。主要撰稿人，除林樂知外，西人有慕維廉、花之安（或作化之安，Ernst Faber）、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）、李佳白（Gilbert Reid）等。助編及撰稿的華人，有沈毓桂、蔡爾康、范淦、袁康、任廷旭等。

## 貳

林樂知無疑是《萬國公報》的核心人物。

這位美國牧師，一八三六年一月三日生於佐治亞州。一八五八年在本州的埃默里學院（Emory College）畢業並獲文學士學位後，便與新婚妻子決定獻身海外傳教事業【一五】，加入了美國的南監理會。一八六〇年七月，他偕妻女和同會教士華美德（M.L. Wood）抵達上海。那時他才二

十四歲，直到一九〇七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病逝，享年七十一歲，居留中國的時間將近四十七年。

按照差會的要求，林樂知入華後，應往杭州拓殖教務。他去了，卻發現這座城市沒法立足，因為它已被太平軍與清軍的爭奪戰所摧破。他只得折返上海，然而上海也在李秀成的大軍圍困之中。那時英美傳教士紛紛前往太平天國的佔領區訪問。林樂知也曾前往天京，受到干王洪仁玕的友善接待。但林樂知事後以為，他在中國的第一課程，仍然是等待和忍耐【一六】，就是說要在中國開展傳教事業，還是在中國的內戰中取觀望態度比較穩妥。

然而林樂知入華僅九個月，美國便發生南北戰爭，一打就是四年。蓄奴的佐治亞州參與了反叛，也化作戰場。在華的監理會教士人數雖少，但失去來自本國教區的經濟支持，生計大窘，傳教更難。林樂知、華美德進退維谷，只得到處打工，藉以謀生。林樂知就販賣過糧食煤炭，替洋行當過跑街——收購棉花或推銷保險，為外國使領館做過譯員。【一七】這類生涯，對他的漢語能力提高和社會經驗充實，很有益處，同時也結識了不少中國人士。

一八六四年三月，由上海同文館（後改稱廣方言館）的首任監院馮桂芬推薦，林樂知受兼任同文館監督的護上海道應寶時聘請，入館任英文教習，但數月後即被新任署上海道丁日昌解聘，顯然丁日昌要以這個位置安插他的幕友黃勝。【一八】一八六七年黃勝辭職，已經陞任上海道的應寶時，又重聘林樂知擔任此職。【一九】他教授得法，不僅重視語言訓練，還結合課文傳授西方科技知識，包括在課堂演示實物模型及帶學生參觀工廠。這種美國式教學法，與明清以來以唯讀聖賢書而不知世事為榮的傳統教學法，大相逕庭，因而很受學生歡迎，也培養了一批在日後斬露頭角的知

時務青年【一〇】。不消說，林樂知沒有忘記他來華的使命，藉此機會，「向學生巧妙地灌輸了基督教教義」【一一】。

除了做教員，林樂知還應一八六八年六月正式開張的江南製造局翻譯學館之聘，擔任在館翻譯【一二】。如所週知，這個翻譯機構，薈萃了十九世紀晚期在上海的中外傑出學者，包括在華的英美和日本等國人士。他們各展所長，分工合作，口譯筆述，成績斐然。江南製造局的中譯西書，在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啟蒙效應，已毋庸贅言。主持口譯的英美傳教士，如在館的傅蘭雅 (John Fryer)、金楷理 (Carl Kreyer) 和林樂知，館外的偉烈亞力 (Alexander Wylie)、瑪高溫 (Daniel J. MacGowan) 等，在近代翻譯史上的貢獻，也為眾所週知。就口譯的論著數量來說，林樂知僅有八種，少於傅蘭雅、偉烈亞力諸人，但影響不小。

那原因，無疑在於其中有一種，其實是近代用中文出版的世界大事年鑑，名曰《西國近事滙編》。它的形式頗獨特，先以不定期的歐美報刊文摘的面目出現，再按年彙集成帙，因而既適應了帝國洋務官員的需求，得以及時瞭解列強的動向，也適應了追求新知的士人們窺視域外情勢的願望。林樂知繼金楷理之後，自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一年，擔任這份年鑑的主譯，持續七年。【二三】他由這項工作，而在中國的官紳與學者中間贏得的知名度，實勝於他同時編輯前期《萬國公報》等工作。

這時的林樂知，主要精力已用於俗世事務。如傅蘭雅在他去世後的悼辭所描述的：「林氏當時工作，極度緊張，晝夜不息，無間風雨，每日上午在廣方言館授課，午後赴製造局譯書，夜間編輯

《萬國公報》。」甚麼時候執行他的傳教使命呢？只能在星期日。【二四】傅蘭雅的描述尚有遺漏，他忘記了與此同時，林樂知還曾相繼主編《上海新報》和《益智新錄》【二五】，也都是世俗性刊物，因而很可能還擠佔了林樂知每週一日的佈道和處理教務的部分時間。

有的研究者，曾把晚清在華的歐美傳教士，區分成四類：基要派，保守派，社會派，自由派。原教旨主義的基要派，墨守傳播福音傳統方式的保守派，都把各自的活動範圍嚴格限於「救靈」。他們都反對傳教士從事社會福利事業，更反對傳教士參與當地的文教乃至政治事務，也就是所謂社會派或自由派的傳教士活動。【二六】關於傳教士的派分，是別一問題。然而假如在晚清凡關心政俗事務的傳教士便稱作自由派的話，那麼林樂知和《萬國公報》的若干撰稿人，例如艾約瑟、慕維廉、傅蘭雅，以及後來相繼主持廣學會的韋廉臣、李提摩太，還有後期重要撰稿人李佳白等，當然都可以劃入自由派的行列。

派遣林樂知來華的美國南監理會，屬於比較保守的差會。它從一八四八年（清道光二十八年）開始派遣本會教士到中國傳教，先後至上海的已有六名牧師，連家屬共十一人，成績呢？開頭費力四年，才說服一對華人夫婦受洗入教，以後也沒收到幾名信徒。原因很複雜，而那些美國人格守所謂直接佈道的傳統，顯然是碰壁的一大由頭。【二七】林樂知本來對遠東社會文化一無所知，但南北戰爭迫使他為生計而涉足中國的商場政界，以俗人的眼光觀察這個陌生的環境。經驗的積累和實用的需要，使他不得不承認利瑪竇以來那種屢試不爽的傳教策略，並沒有因為清政府被迫容忍傳教活動而失效。那策略，就是所謂間接傳教，也就是必須先抓住四民之首的士，迎合他們瞭解域外情